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总主编 檀传宝

公民
教育
研究





Educating Good Citizens :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培育好公民

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

檀传宝 默里·普云特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教育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总主编 檀传宝

公民
教育
研究



Educating Good Citizens :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培育好公民

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

檀传宝 默里·普云特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培育好公民: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 / 檀传宝,
(澳)默里·普云特主编.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36-3124-0

I. ①培… II. ①檀… ②默… III. ①公民教育—对比研
究—世界 IV. ①D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643 号

责任编辑 王凤珠

责任校对 戴正泉

封面设计 韩波

责任印务 陈沁

公民教育研究

培育好公民——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

PEIYU HAO GONGMIN — ZHONGWAI GONGMIN JIAOYU BIJIAO YANJIU

檀传宝 默里·普云特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图文制作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成品尺寸 163mm×230mm

印张 15.5

插页 1

字数 238 000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3124-0

定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总 序

今天,我们为什么亟须开展公民教育?

最重要的理由,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必须大力开展公民教育的积极理由,在于个人生活幸福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建构。前者是个体的视角,后者是社会的视角。

从个人生活角度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我国每一个国民幸福生活需要,乃是开展公民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当然取决于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更高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而一个更重要的指标还在于:作为个体存在,他是否拥有尊严,是否得到善意与平等的对待,是否能够以社会主体的身份拥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与机会,等等。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大国,有条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获得更多的自由、平等与尊严。但是,自由、平等、尊严这类被称为“天赋人权”的东西,却非仅仅依靠制度建设而未经教育即可安享。如何让自由不成为对自由的伤害,让平等不成为平等的障碍,让尊严不成为社会参与的割裂与破坏性力量……这些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通过公民教育去完成的历史课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在于公民教育的开展。中国正走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政府和多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数民众都已经形成了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共识。唯有实现真正的法治，中国社会才能彻底摆脱权大于法的人治思维及其导致的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等泥淖，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法治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制度架构，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作为法治社会的主体，则无论是法治的建设还是法治的实施都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认真研究、实践公民教育，乃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整体文明进步的迫切需要和基础工程。

换言之，要建设法治中国、要让人民生活幸福，高品质公民教育建构与实践势在必行。

至于公民教育的消极理由，下面从国家认同、权利认同两个维度予以简要说明。

当代社会，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国家认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充满挑战的课题。这是因为，一旦国家认同出现问题、国家动荡乃至分崩离析，则不仅“国家”而且普通民众都会付出极其沉痛的代价。近年东欧、中东一些国家的动荡与苦难正可谓殷鉴不远。但是国家认同既牵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复杂的理论争议，更涉及国家与社群、民族，国家与超国家，国家与世界等等现实政治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英国就是一个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典型例子——它既有内部认同问题（苏格兰问题），又有外部认同问题（脱离欧盟后，如何处理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两大问题没有一个是好处理的。当今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甚至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但是就在这个“最好的历史时期”，仍然存在国家认同问题。如何处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公民身份与全球公民、族群成员、社区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全社会最迫切的现实问

题之一,教育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建构理性、和谐的中国公民身份,既是中国公民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公民教育存在价值的重要确证。

权利认同则是基于个体维度的另外一大挑战。一方面,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的历史造成了许多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观念、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惯性,制度与观念的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在公民权利意识的唤醒与教育养成方面,公民教育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另外一个方面,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等美好的词汇又常常成为某些极端个人主义或者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遮羞布。比如:某些年轻人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在现代社会任何意义上都不存在的“啃老”的“权利”的同时,却不愿意承担最基本的赡养父母、抚育子女等法定与道德义务。又比如,灾难发生时,弃学生不顾而率先逃命的教师,竟然试图用所谓的生命权、个人自由等漂亮的“权利”辞藻将自己打扮成个人主义的道德英雄……按照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一个伦理概念只有经过普遍化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概念。换言之,任何只有自己单方面才有的所谓“权利”,其实都是特权、非理性的诉求。没有相应义务的权利,向来都是无法成立的观念妄想。因此,如何让儿童和成人将自己的权利与他人的权利看成是同等重要的诉求,将自己的权利主张与对他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必要义务建立正常、内在的连接,如何让每一个公民都因全面深入地理解不同公民身份的权利与义务的意涵而高贵地生活于当代世界,从而获得世人对中国国民人格发自内心的尊重,同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的教育任务。

简言之,建立理性和牢靠的国家认同、权利认同,更需要高品质公民教育的建构与实践。

认可公民教育对于当代中国发展与进步极其重要的意义,是这套“公民教育研究”丛书以及本世纪初以来慢慢勃兴的中国公民教育研究

共同的逻辑前提。而富有个性与创造性的选题与内容、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作者群体,以及出版社富有远见的大力支持,已经让本套丛书独具特色。衷心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成为中国公民教育理论建设与实践推进道路上一个崭新而重要的里程碑!

檀传宝

2016年8月22日

于京师园三乐居

前 言

本书是我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默里·普云特(Murray Print)教授领衔的一项公民教育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成果汇集。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悉尼大学教育与社工学院(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开展的合作研究项目之一,最初的名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有道德的 21 世纪公民——北京与悉尼的对话”(Educating Moral Citizen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and Sydney)。研究成果的英文版出版时,改成了主题更加明确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 21 世纪“好”公民》(*Educating “Good” Citizen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研究之所以聚焦“有道德的”公民或者“好公民”概念的讨论,是因为已有的比较研究已经发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背景下,人们在谈论“公民”一词时,常常认为政治意味的“好公民”与道德上的“好人”有着当然、内在的关联。这一点与将公民素质主要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政治素养的西方社会主流认识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当然,西方社会与东亚社会的认识一直是处在相互交流、动态建构之中的,以上认知差异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这一点可以从最近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课程建设的相关文件中找到充分的证据。作为项目的发起方,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在项目设计的起始阶段就提出,我们应该聚焦于考察“好公民”概念在东西方理论与实践上的异同,看看通过集中、对话式的比较研究,能够发现或者印证些什么。这一研究提议很快得到了默里·普云特教授和其他澳

大利亚研究伙伴的认同。于是中国、澳大利亚的十多位研究者开始了这项为期三年(2013—2015)的比较研究,本书正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汇集。

本书在英文版《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 21 世纪“好”公民》的基础上又做了一定的改进和调整:一是增加了英文版出版时没有来得及收录的两篇论文——《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教育——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与我国经验比较》(叶王蓓)、《中国教师的好公民观念——一种个体负责任的公民》(李惠、檀传宝);二是按照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对全书做了重新编排。上篇(澳大利亚的“好公民”概念)主要收录澳大利亚的三位专家(默里·普云特、黛博拉·亨德森、安德鲁·彼得森)在公民教育国家课程、世界公民培育、价值观教育项目等领域对澳大利亚社会关于“好公民”概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中篇(中国的“好公民”概念)汇集了中方五位研究者(檀传宝、杜亮、班建武、李惠、张旭平)从学生、教师素养及跨文化交流角度对中国教育中“好公民”概念的探索。下篇(“好公民”概念建构的国际比较)收录了金玟江(澳大利亚)、赵振洲、王小飞、叶王蓓四位专家对中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更多视角、更大范围内探索关于“好公民”概念的合理建构。虽然本书对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聚焦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但是视野远超两个国家,具备广泛的国际比较的视角。

作为集体研究的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澳大利亚双方专家的鼎力支持。大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工作,于 2014 年 1 月完成各自研究计划,3 月提交论文题目及摘要,2014 年年底之后陆续提交、修改论文并定稿。正是得益于大家的认真、敬业,我们才能够按照预期完成同行评议,并且于 2015 年年底由在教育学界拥有良好声誉的出版社(Sense Publishers)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默里·普云特教授是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公民教育研究者、公民教育国家课程设计团队的领衔专家之一。除了和我一起策划、组织本研究之外,他在英文版的出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将英文版转换成中文是一件有意义但十分艰苦的工作。除了各位

作者、译者(按照章节先后排名:叶王蓓、李惠、胡君进、杜健一、陈国清)的重要贡献之外,林可、陈国清两位还在协助我审校、统稿等方面做了重要贡献。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以北京师范大学“985”建设项目(对外合作项目基金)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了资助。作为项目主持人及本书的主编之一,请允许我在这里表达由衷的谢意!

公民教育对于今日的中国与世界都极其重要,而“好公民”认识的厘清、建构对于公民教育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希望本研究能够对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教育与文明上的进步有所贡献。

檀传宝

2016年5月

于京师园三乐居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澳大利亚的“好公民”概念

何谓21世纪“好公民”

——课程的视角 (默里·普云特) /3

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身份课程培养“好公民”的可能性

..... (黛博拉·亨德森) /21

澳大利亚的价值教育与“好公民”的培育 (默里·普云特) /46

公民美德与全球责任

——用基于品德的方法在澳大利亚培养“世界公民”的可能性

..... (安德鲁·彼得森) /64

中篇 中国的“好公民”概念

“公民”还是“私民”

——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大陆中学生公民德性调查与分析

..... (班建武 檀传宝) /89

中小学跨文化交流中的符号权力与身份认同建构

..... (杜亮 张旭平) /136

中国教师的“好公民”观念

——一种个体负责任的公民 (李惠 檀传宝) /148

下篇 “好公民”概念建构的国际比较

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

- 对东西方“好公民”概念的批判性审视 …………… (金玟江) /163

批判性思维与“好公民”

- 中国与澳大利亚课程大纲的比较研究 …………… (赵振洲) /182

公民身份教育中的共同体认同问题

- 中西“好公民”培养模式比较 …………… (王小飞) /200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教育

-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与我国经验比较 …………… (叶王蓓) /223



上篇

澳大利亚的“好公民”概念

何谓 21 世纪“好公民”

——课程的视角

作者：默里·普云特^①

翻译：叶王蓓 审校：檀传宝

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公民身份构建。约翰·杜威，这位著名的美国教育哲学家曾经指出：学校的关键任务就是对下一代进行公民教育。这一观点广受认同。20 世纪，很多国家的教育实践都沿用了这一观点：在教育系统中培养服从的、民族主义的未来公民。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化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挑战。许多国家的政府要面对更多提出质疑、不信任、不积极的公民。而这些挑战，还将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而进一步加剧。当然，很多国家的政府、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意识到，培养积极公民是保证政治稳定和国家繁荣的关键。也许，21 世纪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好公民”的定义。

在澳大利亚，州(state)、领地(territory)、联邦的教育部(自 2014 年起称“教育委员会”，即 the Education Council)联合发布的三个宣言(即三个得到一致认同的、有关关键教育目标的声明)强调、突出了教育政策和有关项目的主要努力方向。其中，《墨尔本宣言》(MCEETYA, 2008)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制定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方面对各地区影响最大的教育文件。这一得到澳大利亚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②一致认可的文件，给澳大利亚

^① 默里·普云特(Murray Print)，博士，教授，悉尼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学科负责人。——译者注

^② 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教育管理权归属于州一级政府。2008 年，澳大利亚共有九个“教育部”——六个州教育部，两个领地教育部，以及联邦政府教育部。——译者注



的学校教育提出了两个关键目标,分别是:(1) 澳大利亚教育追求平等和卓越;(2) 澳大利亚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成为成功的学习者,并成为自信、有创意、积极、知情的公民。

“积极、知情的公民”到底指什么?它是《墨尔本宣言》的基石,而这一宣言已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建设的基础。“积极、知情的公民”等同于“好公民”吗?《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建构:公民学和公民身份》(*The Shape of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Civics and Citizenship*, 2012)^①在强调积极、知情、参与的公民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好公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许多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最新课程标准关注公民教育,并以更整合、综合的方式涵盖了“好公民”的理念,扩展了公民身份概念的外延。本文拟结合新课程,特别是《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建构:公民学和公民身份》的最新发展,来界定“好公民”概念的可能意涵,以及如何通过新课程将这一概念传导给全澳大利亚的学生。本文特别关注以下两个问题:(1) 在澳大利亚,21世纪“好公民”的意涵是什么;(2) 在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中,如何通过国家课程培养“好公民”。

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前的研究,提炼出:在一个联系日渐紧密(政治上各自独立)的世界中,“好公民”的内涵有哪些关键层面。本文也将讨论“好公民”的定义在学校课程中可能是什么样的,以及澳大利亚的国家课程是如何强调和培养这样的公民的。

21 世纪澳大利亚“好公民”

在澳大利亚,什么是“好公民”?显然,这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带有很强的价值观,有争议,且受环境影响。给这一概念下定义有无数的方式。“好公民”的定义很多,无法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例如:一项英国的研究

^① 它是默里·普云特为澳大利亚课程评估报告机构所写,是指导公民学和公民身份课程具体开发的文件。——译者注

分析了年轻人自己理解的“好公民”概念,他们强调负责任行为:遵守法律,关心社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会给议会成员写信。^① 美国的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也常被看作培养“好公民”的一种途径,它致力于培养有道德、行为习惯良好、社会乐于接受的人。^② 美国政治学家罗素·戴顿(Russel Dalton)指出,“好公民”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社区活动的人,有别于传统强调义务的公民。^③ 在分析欧洲“好公民”标准的时候,丹特斯等人(Denters, Gabriel & Torcal)指出,“好公民”意味着守法、团结、批判、慎重。^④ 由此可见,给“好公民”下一个统一的定义非常困难。

进一步讲,在 21 世纪,什么是“好公民”? 这个定义可能有别于以往关于“好公民”的定义和实践,如 20 世纪早期强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公民。^⑤ 近年来,“好公民”的含义指向更全球化,更超越国家的边界。21 世纪,通过旅行、贸易、移民等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且必然会改变我们对公民概念的理解。

要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在澳大利亚,21 世纪“好公民”的意涵是什么),必须参考《墨尔本宣言》。它基于以往宣言^⑥,且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它是澳大利亚运用最广泛的学校教育政策文件,还是国家课程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总之,《墨尔本宣言》是一个解释教育目标的重要政策

① Rowe, N., Sainsbury, M., Benton, T. & Kerr, D. What Is a Good Citizen? The Views of Young People over Time[M]. Slough, England: NFER, 2012.

② Arthur, J. Education with Character[M]. New York, NY: Routledge Falmer, 2003.

③ Dalton, R.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M].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9.

④ Denters, B., Gabriel, O. & Torcal, M. Norms of Good Citizenship[A]. In van Deth, J. W., Montero, J. R. & Westholm, A. (eds.).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C].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7.

⑤ Dalton, R.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M].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9.

⑥ 参见 Nelson, J. & Kerr, D. Active Citizenship in INCA Countries: Definitions, Policies, Practices and Outcomes (Final Report)[M]. London: QCA, 2006; Print, M. Civic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J]. Minorities Studies, 2009 (1): 63-83.